

## “京宗”地望辨析\*

尹弘兵

吴义斌

(湖北 武汉 430077)

(湖北 宜昌 443000)

摘要 《楚居》中的“京宗”之地，楚先祖季连始居，历穴熊至熊狂，时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古代地随人迁，因此《楚居》中的“京宗”很可能不是一个地点，而是楚传说时代末期居地的统一名称，其含义与后来楚都名“郢”相似。“京宗”的本义是兼指政治中心与祭祀中心，二者合一，即古代之“都”。

关键词 清华简 楚居 京宗 季连 熊狂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27(2013)01-0073-0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以下简称清华简)正式发布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的《楚居》一篇，备载历代楚君及其所居之地，从楚始祖季连开始，下至战国中期的楚肃王，对楚国历史地理和楚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京宗”则是《楚居》中传说时代的一个重要地名，为楚先祖所居，从季连晚期至熊狂，半姓一族均居于“京宗”之地。对“京宗”的考释，学界讨论较多，虽对具体地望多有歧议，但一般认为“京宗”当与荆山或荆山之首的景山有关<sup>[1]</sup>，而荆山的地望，虽有不同意见，多数看法认为应在鄂西地区或鄂豫陕交界地区。亦有人认为京宗即《左传》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的宗丘，地在湖北秭归西北<sup>[2]</sup>。

简帛文献研究需将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互证，但《楚居》一篇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楚居》所载楚先祖史事，其地名及史事多不见于文献，这给《楚居》的研究带来很大难度。因此现在对“京宗”的考释，一般是用音韵通假的方法，与《山海经》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建立起联系。《山海经》对于古代地理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其本身已含有较多的神话成分，司马

迁撰写《史记》，亦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sup>[3]</sup>可见对于《山海经》本身已需要谨慎使用，而当整个的论证体系是建立在通、转、假的基础上时，尤令人不安，这在方法论上有较大的危险性。高崇文先生因此认为不能仅凭声韵通假之法来指“京宗”即“荆山”或“景山”，主张“京宗”应即周人之“镐京宗周”<sup>[4]</sup>。

我们认为，讨论地理问题，要有时间概念，不能把时间与空间割裂开来。京宗之地，从《楚居》所载来看，商代晚期时，季连始居于京宗，穴熊(鬻熊)亦居于京宗，至西周初，熊狂亦居于京宗，穴熊(鬻熊)与熊狂之间还有丽季(即《楚世家》中的熊丽)，其居地则未有明言，但从其前后两代皆居“京宗”来看，似亦应居于“京宗”。可见“京宗”的时间跨度甚大，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初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商周之际剧烈变动的时代，半姓部族在此一时期很有可能曾发生迁徙。古代地随人迁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名随人迁徙是历史地理学上的一条重要规律，故《楚居》所记载的“京宗”很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地点，而是这一时期楚人居地之通名。因此我们在探讨“京宗”地望时，应首先把不同

收稿日期 :2012-11-17

作者简介 :尹弘兵(1967- )，男，湖北天门人，历史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时期的“京宗”区分开来。

## 一、季连所居之“京宗”

据《楚居》记载,商代晚期时,季连见盘庚之子,并追求其女“比佳”:

(季连)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比佳,秉兹率相,置冑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緹伯、遠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sup>[5]</sup>

由此记述来看,季连在娶商王盘庚之孙女“比佳”为妻后,生二子緹伯、遠仲,并居于“京宗”之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族群的发展速度不太一致,从总的架构来说虽然此时已进入商代,但从楚史的角度来讲,此时的半姓部族仍处于传说时代。故《楚居》中所载的季连及其二子緹伯、遠仲,不应作为人名来理解,应视为部族及部族内部的支系,在一般情形下,传说时代的人名不是指特定的个人,而是部族和部族首领的名称。古人对此,其实很早就有认识,《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季氏大夫大史克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改、栲戴、大临、虬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大史克前言“才子八人”,后言“十六族”,可见大史克所言之“子”,与“族”同义,所言之“人名”,即“族名”,同时也是部族首领之名。晋郭璞则谓:“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sup>[6]</sup>唐司马贞释“少典之子”时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sup>[7]</sup>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上古时代的人名与族名相混,不可作为个人来理解。近代以来,学者们更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徐旭生强调,在治传说时代的历史时,“顶重要需要声明的一事,就是在当时社会的单位是氏族,而氏族的字与个人的名字常相混淆,无法分辨。”<sup>[8]</sup>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则明确指出:“神话传说中的所谓炎帝、黄帝、蚩

尤、颛顼、共工之类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或结盟、或通婚、或兵戎相见。如果把他们当作某些具体人物来看待,那就错了,因为他们并非具体的人,而是指某些氏族或部落。然而,把这些‘人物’名字完全理解成氏族部落的名称,也未必然。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名往往是和部落名相一致的。史书上经常说的某人生某人的现象,除了存有父子关系的意味外,其基本含义则是氏族分支或部落分支的关系。”<sup>[9]</sup>由是可知,《楚居》所载之楚传说时代之人名,由季连至熊狂,均不得以个人来看待,而是应视之为部落或部族名与部族首领之名。

进而言之,《楚居》中的季连,有几层含义,首先是指季连部族,其次是指季连部族的首领,第三才是指在某个特定时期担任部族首领的个人。如追求比佳的季连,同时具有这三层含义:首先是在第三层含义上存在,是此时担任季连部族首领的特定个人,其次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季连部族首领,最后才是最一般意义的季连——季连部族。而大部分语焉不详的季连,所指仅是季连部族和季连部族的首领,不能用指某个特定的个人。只有在某些特别情形下,传说时代的人名才能理解为特定个人。

季连追求比佳,时为商代晚期,具体为武丁以后,季连部族与盘庚之子联姻成功,部族繁衍,人口增加,内部出现了新的支系。由此可以推知,季连及其二子所居之京宗,当去盘庚之子的居地不远。虽然我们 cannot 确知“京宗”所在,但可以由此空间关联性,由盘庚之子的居地来推测“京宗”大致地域。

至于盘庚之子的居地,既为盘庚之子,则其身份为商王族,是商王室的核心成员,其居地当在商朝核心区内。而商核心区,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文化分析,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确定。在考古学上,晚商文化分为多个类型,而其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显然是殷墟类型,殷墟类型的分布地区,当为商王朝核心区所在。而盘庚之子的居地,以及距其不远的季连、穴熊所居的“京宗”,亦当在殷墟类型的范围内探

求。

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分布范围,是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包括今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及中部地区<sup>[10]</sup>。考虑到季连初降之地的“鄴山”,目前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意见,均认为其当在今河南省禹州市、新郑市、新密市三市交界处的大騊山,又名具茨山,新郑又是祝融之墟所在,地点均在今河南省中部地区,则可知季连初处之“京宗”,似当在今河南省中部地区。

至于谓“京宗”与荆山或景山有关,地在今豫西南至鄂西地区,从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说,是难以解释的。

按商自盘庚迁殷之后,结束了“九世五迁”的动荡时期,从武丁开始,商朝进入了稳定而强盛的晚商时期(殷墟时期)。

晚商时期,商朝在政治、军事及青铜文化上均达到了全盛状态。但晚商并未能扭转中商以来商势力的衰退局面,周边民族则是全面兴起,对商朝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前赴后继,此伏彼起,尽管商人极力振作,大杀四方,在军事上取得连续胜利,但商人在军事上的胜利并未能改变商朝势力的全面退缩局面,反映在陶器遗存上,晚商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之早商时期大大退缩;今湖北、陕西、山西、江苏境内许多原早商和中商文化分布带,至晚商时期不复为商文化的滞留地,而为性质不同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所取代。惟山东境内商文化向东保持着微弱的进取势头<sup>[11]</sup>。

相对于季连部族可能的活动地区来说,湖北地区的商文化主要分布在汉水下游、鄂东盘龙城一带,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的年代只是从二里岗上层一期到上层二期晚段<sup>[12]</sup>,如按中商文化的概念,盘龙城遗址最晚可至中商二期,湖北地区也分布有较为广泛的中商文化遗存,但不见有晚商遗存,至晚商早期商文化已退出湖北,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基本为地方性考古学文化所覆盖<sup>[13]</sup>,在汉水上游,新近发掘的辽瓦店子遗址表明,最迟殷墟一期以后,商文化亦退出汉水上游地区<sup>[14]</sup>。陕南商洛地区属丹浙流域,从东龙山遗址可知,其商文化遗存亦只到二里

岗时期,不见有殷墟遗存<sup>[15]</sup>。可见晚商时期,商文化已全面退出湖北、陕南,由此可以推知季连所居的“京宗”及见盘庚之子的“川水”、“方山”等地均不得位在湖北、陕西等地。

至于河南,今河南全境仍属晚商文化分布区,其中殷墟类型分布于河南省北部及中南部地区。在豫西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较少,虽然其面貌尚不清晰,但相对于河南省中部和北部地区来说,其已属于商朝势力的边缘地带,应可确定。豫南的信阳地区则为晚商文化天湖类型分布地,河南罗山县蟒张天湖墓地,出有多件带族徽的铜器,据学者考证为商代息国贵族的墓地<sup>[16]</sup>,因此信阳一带当为古息国所属,陶器遗存也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性。由此看来,既为“盘庚之子”,则其不当位在商文化分布较为稀少的豫西南地区,更不当为晚商文化南部边缘的豫南地区,这里是古息国所在。

可见晚商时期,殷墟文化的分布范围已较早商时期的二里岗文化大为缩小,商文化已退出湖北、陕南地区,甚至有可能还退出了南阳盆地,因此季连及其二子所居之“京宗”,就不可能位在鄂西及鄂豫陕交界地区,其在南阳盆地的可能性也很小。亦不可能在关中地区,周人在武乙时始迁于岐,可知季连的时代,尚无“镐京宗周”,因此季连所居之“京宗”也不可能在关中,而只能在殷墟文化分布较为密集的河南中部地区。

## 二、穴熊所居之“京宗”

从《楚居》所记穴熊的活动来看,在季连及其二子“先处于京宗”之后接着就说“穴熊迟徙于京宗”,由此看来,穴熊最初所居之“京宗”,当即季连所居之“京宗”。

但季连部族演变为穴熊部族之后,似乎有所迁徙。《楚居》说:“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载水,罕状聂耳,乃妻之,生亓叔、丽季。”穴熊“徙于京宗”之后,即有“逆流载水”之事,可见季连部族演变成为穴熊部族之后不久,似乎就离开原居地,开始了迁徙的历程,而《楚居》明言穴熊与熊狂皆居于京宗,独不言中

间的丽季所居之地,似乎亦透露出此时半姓一族正处于迁徙之中,居无定所的信息。

穴熊与妣列成亲之后,生佷叔、丽季。但丽季出生时,发生了意外,“丽不从行,渍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赅其胁以楚,抵今日楚人。至熊狂亦居京宗。”整句的意思是丽季的出生不太顺利,结果导致妣列去世,用荆(楚)条将妣列之胁缠包复,从此有楚人之称。这一段记载,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需认真解读。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段记叙颇具传说色彩,虽然此时应在商末,从大的历史框架来说,肯定已是历史时期了,但对楚人来说,则还未走出传说时代,因此不能将之视为荒诞不经,也不能以单纯历史学思维来强行解释,如释“渍自胁出”为剖腹产之类。

既然此时楚人还处于传说时代,则穴熊、妣列、丽季就不能理解为个人。穴熊仍是部族名和部族首领的名称,妣列则是穴熊的配偶,则可视作穴熊部族之姻族,丽季为穴熊与妣列之子,应为穴熊部族内部新出现的支系,而“渍自胁出”则是指部族支分的情形,不可强解为“剖腹产”,但因部族支分导致妣列死亡,则应是指穴熊部族因某种原因和其姻族断绝了关系。

穴熊部族因其内部出现丽季支系而与其姻族断绝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从后面“巫并赅其胁以楚,抵今日楚人”这一句来看,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应是穴熊部族的族群属性发生了变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均证明楚之先祖出自中原华夏,季连部族始终生活在传统的中原文化核心区,穴熊部族初形成时亦当如此,故穴熊之姻族亦当为中原旧族。但妣列死亡之后,穴熊部族却有了楚人之称。

从此时开始,半姓一族才与“楚”之名号有了交集,才开始有了“楚人”之称。很明显的是,这里的“楚”,在人文层面,是指早于半姓楚国而存在的“楚蛮”。楚蛮为古三苗的遗裔,三苗灭亡后,其遗民接受了中原文化,从而形成了商周时代的楚蛮族群,商代及周初,楚蛮活动于鄂豫陕交界地区和汉东地区<sup>[17]</sup>,季连部族源

出祝融,是华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一直活动在传统的中原文化核心区,穴熊时却与“楚”发生了交集,这表明穴熊部族似是从中原迁徙到了南方“楚地”(楚蛮之地),从此有了“楚人”之称,而“楚人”这个称呼则表明穴熊部族的族群属性发生了变化,由华夏变成了楚蛮。按半姓本为中原旧族,到西周时却被视为楚蛮,《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可证。半姓从中原旧族变成楚蛮,其族群属性的转换当始于此。

由于穴熊部族的这一迁徙行动,从此半姓一族与楚蛮为伍并导致其自身的族群属性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似不被其中原姻族所接受,双方可能发生了较大的矛盾,“妣列宾于天”或许就是此一矛盾的体现。而“逆流载水”一句也证实此时的穴熊部族已离开季连的原居地,有所迁徙。另《楚居》载有季连居地,亦载穴熊初居之地,丽季之后的熊狂亦有居地,这些居地均冠以“京宗”之名,惟不记丽季居地,可见丽季之时,半姓一族尚处于迁徙之中,居无定所,故《楚居》不记丽季居地,此亦半姓一族自穴熊后期起处于迁徙之中的旁证。

### 三、熊狂所居之“京宗”

《楚居》在叙述完丽季的活动之后说“至熊狂亦居京宗”。熊狂,熊绎之父,大概是《楚居》所载楚先世中第一个可以确指的历史人物,但其所居仍为“京宗”,表明熊狂在《楚居》的体系之中,仍处在传说时代,准确地说处于传说时代与历史时代之交,是传说时代结束与历史时代开始的人物。

熊狂之子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则熊狂的年代大致为周武、成之交。从文献记载来看,商周之际,周楚关系颇为密切,从鬻熊开始,半姓部族就与周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楚世家》记载鬻熊曾与太颠、闳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周初重臣投奔周文王,并曾为文王师。鬻熊事周,当是以其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辅佐周文王,鬻熊的子孙也因此得以服事周室<sup>[18]</sup>,熊绎受封时,是以“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受封。成、康

时期,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供职周室(事见《楚世家》及《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语)。周成王举行岐阳之会,熊绎亦曾参与,在会中负责守燎(事见《国语·晋语八》)这可能是其父(熊狂)祖(熊丽)所留之职。周原甲骨文亦记载周初时楚与周的关系:“日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其微楚 毕夔,师氏受夔。”<sup>[19]</sup>这些记载表明,商末周初时,半姓一族与周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半姓首领不仅前往关中拜会周王,而且曾参与周室的燎祭,并在周室的重大盟会中任守燎之职。

当然,对于周原甲骨,李学勤先生最近有一些新的意见,认为周原H11:3中的“楚子”非是指楚君,而是“嗣子”,全句的意思是楚国嗣子要来报告其父安排后嗣,要将他囚禁起来;H11:4中的“其微楚”之“微”字当释为“愆”;另周原H11:14,过去一般释为“楚伯迄今秋来即于王其则”,李先生以为“则”当读为“贼”,其意为杀,意为周王卜杀楚君。“因此熊绎之世楚与周朝关系良好,与凤雏卜甲所说不合。”<sup>[20]</sup>我们认为,李先生此说值得商榷,谓“楚子”非指楚君,而是指楚之嗣子,是因争嗣来向周王报告的,纵此说成立,然周王不问事由,即要将其囚禁起来,这很难令人信服,因楚之嗣子既然向周王争取支持,至少也应有信心周王就算不支持他也不会对他不利,且释“楚子”为“楚君”,有经传可考,未可轻易否定。至于说到周原H11:14号甲骨,我们赞成释“则”为“贼”,但是在这里要强调指出,西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年,既有楚国又有楚蛮,《楚世家》“封熊绎于楚蛮”,可见半姓楚国是封于楚蛮之地,楚国与楚蛮在西周时期尚是二分的局面,此时的楚国极小而楚蛮极大,何介钧早年曾指出:“不是因为封了楚子,丹阳一带才被称之为楚,而是因为丹阳一带世为楚蛮所居,所封子国因袭该地民族(或地域)名称,取名为楚”,这是楚国与楚蛮之间的因果关系<sup>[21]</sup>。楚国与楚蛮二分的局面至东周时期才终结,《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此后

楚蛮尽为楚国所并,作为一个族群才从历史上消失,以后便只有楚国而无楚蛮。但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是楚国与楚蛮二分的局面<sup>[21]</sup>。而周原甲骨中,“楚子”与“楚伯”,两个楚字明显不同:“楚子”之楚,字形为𠄎,与后来金文中的“楚”字写法完全一样;而“楚伯”之“楚”,字形为𠄎,二者有异。联系到西周时期楚国与楚蛮二分的局面,这两个“楚”字的差异或许就是半姓楚国与南方楚蛮的差异。此外,西周初年的楚国微弱之极,无论如何不能称为“伯”,而且西周初年的楚国是周之封国,楚蛮则是南方土著,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时服时叛之间,李先生释“则”为“贼”,正合楚蛮对中原王朝叛服无常的特质。而且西周早期周楚关系密切,屡见于史籍,在未有过硬证据之前,未可轻加否定。

因此之故,许多学者主张,商末周初之时,半姓一族的居地应靠近关中,这就是早期楚都探索中著名的丹阳淅川说及由淅川说发展而来的丹阳商县说的重要论证。石泉先生认为,“丹江流域与关中平原联系最为近便的地带,是位于今陕南商县(旧称商州)附近的丹江上游河谷平原,由这里往西北,溯丹江上源,经蓝关,越过秦岭(这一带山势较平缓,是古来交通要道之一)就到达关中平原的蓝田县境,更往西北不远就是西周初年的都城丰——镐(在今西安市西)。”不仅如此,在丹江上游的西面,今商县西北、西南以至东南的商洛镇一带,有多处的楚山、楚水,在楚山、楚水的东北方丹江上流北部(偏东),还有荆水。荆、楚二水入丹江处,相去不过25里,商州城位于这一段丹江的河湾之中,正在“丹水之阳”。在考古方面,此地分布着大量的古遗址,有较发达的古代文化,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关中平原有密切的联系,自然条件也较为优良,是丹江上游河谷平原中面积较大、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最早的丹阳当在此地<sup>[23]</sup>。

《楚居》中并无“丹阳”,对这一问题还要加以深入探讨。但丹阳淅川说及由淅川说发展而来的丹阳商县说与商末周初时期周楚之间

的关系契合度最高,在早期楚都的探索上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探讨熊狂“京宗”居地亦有重要的启示。因此我们的意见,熊狂之时的“京宗”,当在距周京不远之处,其区域应为陕南丹江流域。

#### 四、“京宗”之义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意见,即“京宗”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商代晚期季连所居之“京宗”和穴熊最初所居之“京宗”应在中原地区,周初熊狂所居之“京宗”应在靠近关中的某个地区,或在丹江流域,二者肯定不是一回事。

由此看来,“京宗”应是传说时代末期楚人居地的统一名称,其含义与后来楚都名“郢”,或有相似之处。

高崇文先生对“京宗”的含义作了详细的考释,指出“京”在周代有特殊含义,用来指都邑,此后“某京”一般指表示为某处都邑,周之镐京又称为“宗周”;“宗”字原义为宗庙,殷商时代已常用,甲骨文中殷人宗庙称为某某宗,如大乙宗、大丁宗、大甲宗、大戊宗、大庚宗、中丁宗、祖乙宗、祖辛宗、祖丁宗、小乙宗、武丁宗、祖甲宗、康丁宗、武乙宗、文丁宗等等,而镐京之所以称为“宗周”,是因为其地有周王室的宗庙,镐京之称为宗周,是表示此地为周人祖神与王权所在之地<sup>[24]</sup>。

高先生的考释给我们重大的启示,“京”字在周代往往用指都邑所在,按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意见,“京”字“象宫观屨屨之形。在古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属。王者所居高大,故有大义、有高义。”<sup>[25]</sup>可见“京”字本义当指宫观,即王所居之处,而“宗”字在商代起即有宗庙之义。通俗一点说,“京”字指王所居之宫殿,有政治中心地的含义,“宗”字指宗庙,有宗教或祭祀中心地的含义。先秦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政治中心必有宗庙,或者说,有宗庙之地才是政治中心,《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可见“都”是建有宗庙的聚居地。或者说,

三代之“都”,是政治中心与宗教祭祀中心的复合体。故“京宗”之义即在于此,兼指政治中心与祭祀中心,二者合一,即古代之“都”。由此可见,“京宗”即是半姓首领所居之宫观与半姓一族祭祀先祖之宗庙的合称,用以指代都邑所在,可见在《楚居》之中,“京宗”的含义,即是半姓一族“都邑”的专用名称,犹后世楚都之称“郢”,周都之称“镐京宗周”。

而商代晚期至商末周初,半姓一族已极为衰微,只是一个很小的部族,可能只有一个居地,此居地内必有半姓首领之宫殿与半姓一族的宗庙,故其居地名之为“京宗”。而有宗庙、有首领之宫殿,即为古代之“都”。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ZH244)和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科研课题“楚都丹阳探索”(合同编号NK11)系列成果。

注释:

[1]李学勤《论清华简 楚居 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宋华强《清华简 楚居 1-2号与楚人早期历史传说》《文史》2012年第2期,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新材料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文物》2012年第2期。

[2]陈民镇《清华简 楚居 集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9月23日。

[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4]高崇文《清华简 楚居 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按本文所引释文主要依据此书,并参考复旦大学古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所作工作,释文尽量使用通行字,不另注。

[6]《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黑齿”条郭璞注。

[7]《史记》卷1《五帝本纪》“少典之子”句下司马贞《索隐》。

[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9]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页。

[11]同[10]。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

[13]同[10],第266~267页。

[14]王然、傅玥《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研究》,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王昌富、杨亚长《商州发现一处大型夏商遗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10月26日;杨亚长等《商州东龙山遗存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杨亚长《东龙山遗址的年代与文化性质》,《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9日。

[16]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17]关于楚蛮及其与半姓楚国的关系,参刘玉堂、尹弘兵《楚蛮与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及张硕、尹弘兵《楚蛮的考古学观察》,《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

[18]参尹弘兵《鬻熊史事解析》,《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

[19]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物》1979年第10期;侯志义、陈全方、陈敏《西周

甲文注》,学林出版社,2003年。

[20]李学勤《论凤雏卜甲中的周王与楚》,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21]关于楚国与楚蛮的关系,参拙著《周昭王南征对象考》,《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荆楚关系问题新探》,《江汉论坛》2010年第3期;《楚蛮与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2]何介钧《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23]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又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6-190页。

[24]高崇文《清华简 楚居 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25]《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 A Discussion on the Location of "Jingzong"

Yin Hongbing

(Wuhan, Hubei 130077)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Jingzong*, recorded in Chapter *Chuju* of *Tsinghua Bamboo Strip Manuscripts*, was a place where *Jilian*, the ancestor of Chu People first lived, who was succeeded by the following ancestors from *Xuexiong* to *Xionguang*, during the time from late Shang to Early Zhou. Since the place name sometimes moved with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Jingzong* may refer to a place name that moves with migrations, a phenomena similar naming Capital *Ying* in later times. Thus the paper suggest, instead of being for a single location, *Jingzong* originally refers to places either the center of politics or sacrifices, combinations of both making it to serve as function of "capital".

Keywords: *Tsinghua Bamboo Strip Manuscripts*, Chapter *Chuju*, *Jingzong*, *Jilian*, *Xionguang*

(责任编辑、校对:凡国栋)